

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机理、挑战与路径

王永香,王心渝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信息技术出现以来,协商民主经历了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四个阶段的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战略任务、协商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需要以及数智协商实践的创新探索共同构成了协商民主的数智化转向。数智技术通过“环境优化-主体激活-机制创新-效能提升-文化培塑”的赋能机理,以构建数字协商空间和合作性环境为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创设前置条件,以结构重组、意识增强和技能培育激活调动参与主体内驱力,以议题确立、流程管理、风险评估和智能调整等运行机制创新精化协商过程,以成果转化、执行和监督效能提升促进协商善治,以数智协商文化培塑和价值传播赋能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然而,数智技术赋能也面临民意舆情治理和信息安全保护增难、数智嵌入与民主价值冲突、算力基础设施和协商渠道建设不足、技术操纵和平台悬浮等风险挑战。在实践中推进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加快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多元主体数智素养的基础上,深化数智技术与各协商渠道的嵌入融合,提升赋能均衡性,完善制度机制与法治保障,以价值逻辑和人民立场引领数智赋能向善。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数智技术;技术赋能;数字治理

党的二十大明确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列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改革任务,要求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方式^[2]。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历史性交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3]“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

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4]因此,如何把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战略任务,抓住历史赋予的协商民主创新机遇,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更好地将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重要议题。

数智技术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与5G等泛在互联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与区块链等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深入融合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思维、应用和发展体系^[5],是数字技术的高阶形态和扩

引用文本:王永香,王心渝.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机理、挑战与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3):1-13.

基金项目:国家民族研究项目(2024-GMXB-00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024E004);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24Y2512)

作者简介:王永香(1985—),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主政治与数字治理研究。E-mail:yxwang2015@xjtu.edu.cn

展,更加注重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分析与决策优化。近年来,数智技术不仅成为重塑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关键驱动力,也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6],数字政协、数字人大等数字化改革探索和南京栖霞区“掌上云社区”微信群、衡阳大广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应用系统、淮安“码上议”平台等基层协商治理实践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学界已注意到数智时代的民意形态变迁和民主政治发展机遇,提出了“网络协商民主”^[7]“数字协商民主”^[8]“数智协商民主”^[9]等协商民主新形态。现有数字赋能协商民主研究,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逻辑理路展开探讨,提出问题和对策;另一方面,基于地方数字政协^[10-11]、数智协商基层实践^[12]等案例深描,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法律和制度保障不完善、技术认知偏颇、数字素养阙如等突出问题,并从创新协商机制、优化系统功能、加强人才支撑等方面总结了有效经验。现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发,但也留下了不少可探索空间。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数字技术赋能,鲜有对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直接研究,缺少对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

作用机理的系统性论述、全景式展现和深入理论探析,对智能技术嵌入细节的专业分析有待提升,同时尚未结合“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新任务新要求分析现实困境,并提出更符合现有形势、可落地的推进策略。鉴于此,本研究立足“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战略把握和内涵解读,基于技术变迁、政策指向和实践路向研判协商民主数智化转向,剖析数智技术以“环境优化-主体激活-机制创新-效能提升-文化培塑”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系统性作用机理,分析赋能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提出可操作的针对性路径。

一、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及其数智化转向

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13]。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4]。在人类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形态始终与社会形态相匹配^[15],与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不断回应各个时代的实然要求,进而在不同情景和条件下衍生出多元化实践模式”^[11]。经由信息技术载体的迭代升级,协商民主经历了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四阶发展(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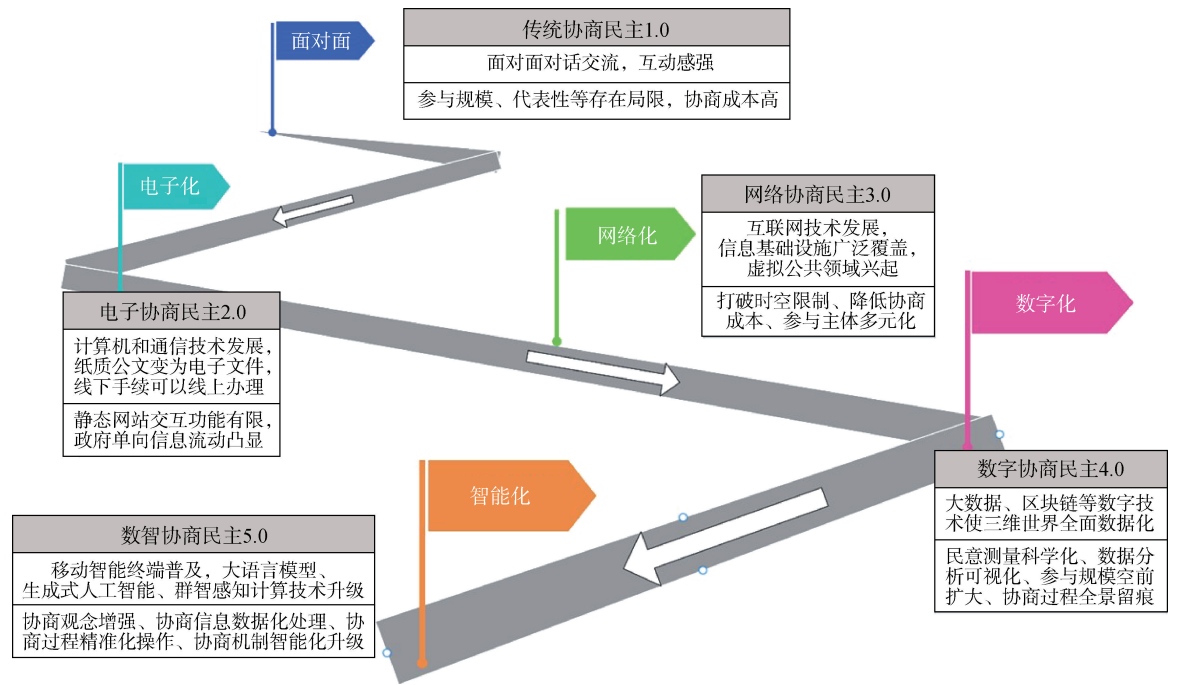


图 1 技术变迁下协商民主发展脉络

前信息时代,传统协商民主以面对面直接对话交流为特征,采用座谈会、议事会、听证会、民主恳谈会、民主评议会等协商形式。协商主体可在沟通中利用表情、言语和体态等表达真实情感和想法,互动感强,但组织成本和参与门槛较高,在空间广度、信息传播、参与规模、协商代表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电子民主是信息技术发展初期衍生出的一种新型民主形态^[8]。“电子”强调信息载体的物理属性,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线下手续可以在线上完成,实现纸质公文向电子文件的信息化转变。电子协商民主以公共论坛、门户网站为依托,通过政务公开与在线交流增强协商民主监督力量,拓宽了协商场域和民意表达渠道。但此时,网站建设多为静态,提供的交互功能有限,用户往往只能被动接收信息。

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这一虚拟公共领域因其去中心化、大众化、开放性、即时反馈等特征打破了时空限制,显著降低协商成本,成为践行协商民主的理想场域。网络协商民主通过网络问政平台、远程协商平台、政务新媒体平台等制度化平台开展协商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社群、在线平台等新渠道吸纳群众参政议政,以网上提案、在线辩论、民意调查等方式表达意见和诉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协商民主的工作场景被置换于数字时代。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协商民主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产物^[16],利用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吸纳更多行动主体,更广泛有效地参与协商实践。信息爆炸增长、民意复杂且分散,协商民主不仅需要网络化的多元参与和协同互动,还要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数据化,使协商涉及的所有信息具有标准性和易处理性,为科学化测量、可视化分析、智能化决策和自动化执行提供数字化基础。

随着数字社会的深入发展,移动智能终端大规模普及,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标志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数智技术是在数字化基础上融合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的过程^[17]。数字技术是将信息转化为二进制数字

形式进行存储、处理与传输的技术体系,而数智技术是数字技术的高级形态和扩展,不仅包含了数字技术的所有要素,还引入了智能化的算法、模型和方法,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决策智能化水平。两者的区别在于智能化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数智协商民主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赋能下协商民主的新形态,其数智转向顺应政治建设目标和科技革命潮流,在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前提下向着数据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发展^[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是提高协商民主质量的重要基础,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健全提案、调研、考察、会议、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民主监督等方式,结合实际搭建对话交流、恳谈沟通平台”^[19]。《全国政协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确要求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寻求信息化条件下的“最大公约数”^[20]。立足战略任务和政策指向,“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理论愿景要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特征相契合,“全面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19]。其中,“全链条”要求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在完整的政策议程中实现“好商量”的过程;“全方位”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衔接有序的协商民主体系;“全覆盖”旨在协商主体跨越地域、阶层和群体差异,广泛覆盖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和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协商客体贯穿“五位一体”布局和国家治理各层级,与生产生活领域全面融合。

立足时代背景和实践导向,协商民主是现实的、具体的治理导向型民主,“要在时代里扎根、在实践中成长,借助一个时代的新技术为自身赋予新的能量就是必然”^[21]。协商民主探索的宏观要求与微观需求、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显著优势,使协商民主数智化转向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新时代以来,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覆盖,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数字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数字政务服务提质增效^[22]。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23]。当前,全国各地既有数字政府、数字人大、智慧政协等数字化改革探索,也有“米市协商铃”“和谐百席”微信小程序等地方特色实践和“掌上云社区”“线上议事厅”等基层协商平台,广泛覆盖国家大事和民生实事,参与规模空前扩大,治理效能显著提高。以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就是要以数智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平台为支撑,拓展数字协商空间,创设合作性协商环境,激活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热情,构建多元主体协商治理新格局,精化协商过程,建立协商民主运行智能机制,强化协商成果转化、即时反馈和长效监督,促进数智时代协商文化的形成、创新和传播,形成数字中国建设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同频共振。

二、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作用机理

数智技术不仅从工具层面赋能协商民主的全面发展,其本身内含的民主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通过“环境优化-主体激活-机制创新-效能提升-文化培植”的赋能体系,推进协商民主的全面健康高质量发展。

1. 优化协商环境,创设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前置条件

协商环境是指协商活动赖以发生并受其影响的一系列条件和背景,具有客观存在性和动态发展性。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数字协商空间和合作性协商环境,为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创设前置条件。

在硬环境维度,数智技术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开放联动的数据资源、数字平台和智能设施,使协商场景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公共辩论和协商是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24],数智技术突破封闭性和在场限制,构建了超大规模公共空间和自由出入的“赛博圆桌”,大幅节省协商参与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数字协商平台的全时域、移动化和可视化则增强了用户场景切换的便利性,使人们通过图文音频等多媒体

介质表达诉求,享有兼具即时性与持续性的民主生活。在数智协商新场景中,VR、AR、MR、ER等沉浸式技术可以实景还原商谈情景,打造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如两会期间“人民视频APP”推出AR功能,用户扫描《人民日报》即可在手机上观看到现场实况、注释信息、数据可视化等深度内容,由此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两会动态,获得沉浸式体验。

在软环境维度,数智技术构建了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的信息生态,营造了合作性的协商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推进合作^[25]。数字平台具备高容量的信息传播内容、最大化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个性化的信息检索功能,高速发展、自由流通的信息网络在为参与主体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也让“拥有更多信息的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反应”^[26]⁷⁷,从而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和群众诉求响应。数字平台也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和交互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增进常态互动和全方位了解,为理解和解决协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意见冲突铺设桥梁。参与者在摆脱与他人面对面交流产生的压力感和障碍感后,可以更加真实地自我表达。

2. 赋能协商主体,激发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内驱引擎

协商主体是指在协商过程中与议题有关的各利益相关方,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民主所包含的全部价值要素。协商民主全面发展需激活调动协商主体的内驱力,夯实主体依托。

一方面,数智技术推进协商参与广泛多层次、主体结构多元平等。协商民主的参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主体的构成,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可以充分实现民主酝酿^[27]。基层协商聚焦百姓日常生活琐事,对利益相关之外的其他人士吸纳性不强,民意征询范围不够广泛。而数智技术重构权力的归属及其运行状态,使“自上而下”的权力向度转向多层次多节点互动的向度,“自下而上”的选择性、时滞性民意表达转向开放性、实时性,对冲科层组织的垂直管理架构和单向沟通,将“协商结构由官民二分转变为多元融合,协商范围由局部性转变为全域性”^[28],形成全主体覆盖的参与图景。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收到网民建言超百万条,多地政府通过网络直播会议等形式开展政策宣讲和在线互动^[29]。数字场域的虚拟化与扁平化则进一步模糊了协商主体之间的身份、年龄、性别和知识势差,对抗话语权失衡,为弱势或少数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增强参与主体协商素养、技能和协商意愿。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成熟的必由之路,也是孕育公民理性的催化剂,是公民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在协商意识增强上,民众通过数字硬件、软件的应用感受到自己的主动性和控制权,获得了一种自我增强的精神状态和权力意识,敢于通过政治参与和协商行为争取自身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在协商技能培育上,数智技术提供了在线教育和个性化学习平台,增加了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机会,使协商主体在学习与尝试中提高自我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理性判断和思维能力。而“如果能够使得人民自身进行协商,那么就会增强人民进行协商的意愿”^[30],形成“积极参与-有效协商-增进能力-养成习惯”的良性循环。如,杭州戴村镇和浙江大学联合研发的“映山红”小程序通过积分排名激励村民主动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议事决策,点击“我要评分”可为他人的菜地庭院等进行实名制评价赚取积分,通过“我要发起”可自己组织公益活动赢积分,让村民回归自治主体,在实践中提升参与意识和技能^[31]。不只局限于社会公众,数字驾驶舱、政务云、智能文档、决策大模型等数智技术也使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协商治理能力实现了跃升。

3. 精化协商过程,创新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运行机制

协商过程既是协商民主实践的外显特性,也是影响协商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32]。数智技术创新协商民主的运作机制可以实现“议题确立-协商互动-决策生成”链条的有效运转和智能衔接。

第一,精确化议题确立环节,创新议题征集和筛选机制。协商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党和政府工作重点、领导关心的重要事项、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和网络热点问题^[33]。社交媒体时代,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成为日常生活中民众意见表达的重要信息源,平台和政府可以通过舆情监控对信息进行提取、甄别与分类,将分散无序的民意诉求量化为数据并转译、清洗和过滤,剔除谣言、攻击等虚假不良信息和情感化诉求,利用聚类分析、大语言模型从中提炼核心观点与凝聚共识,形成精确化、实质性议题矩阵,再根据由协商原则和规则编制的算法程序对多元议题与诉求进行自动排序,科学完成协商前置工作。

第二,精细化协商互动环节,规范流程实施机制。不同于传统协商的操作随意性,技术嵌入和算法设计建立在严格步骤和精密程序的基础上,要求协商中所有不成文的规定、共识和依据以用户需求分析文档的形式细化和确定,再根据协商的不同目标、不同渠道灵活改造流程,将操作日志数据留痕。如,戴村镇“映山红”乡村治理试验引入区块链理念和技术,建立公平合理的奖励机制,通过日常行为数据采集给村民画像,激励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议事决策。与传统的积分激励相比,村民通过贡献获取的积分记录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透明不可篡改,在赋分模型下众多数据汇总至区块链分析平台,贡献量的统计也更具准确性和科学性^[31]。

第三,精准化决策生成环节,建立风险评估和智能调整机制。深度学习通过模拟人脑神经元的工作原理,从大量数据中学习并进行模式识别和决策,可在新数据输入后作出最优预测。因此,机器学习模型能够生成不同条件下决策的运行状况,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估实施效果的各种可能性,并提出最优决策建议。决策实施后,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挖掘可从文本数据中提炼关键信息和意见立场,科学掌握公众的情感倾向和对不同民主政策的舆论反应,从而提供更为精准的调整建议。

4. 落实协商成果,提升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治理效能

“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34]共识达成只是协商过程的阶段性成果,而不是协商民主的终点。协商决策执行、监督

和反馈需要持续跟进,保障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和过程运作的规范性,推进协商民主的成果落地和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数智技术力促协商成果转化和执行。就决策来说,真正的绩效还要观察其执行过程和结果。在数智技术加持下,协商政策执行全过程和进度公开透明可视化呈现不仅可释放政策效能,及时发现、纠正和破解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问题,而且增强了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意识和利益相关方的监督意识。数字人大、智慧政协、政民互动网页等平台应用使议案、提案、建议的报送、办理及反馈环环相扣,明确了各个环节的流转时间和处理方法,提高了协商成果转化的时效性。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强化协商成果监督和反馈。通过数据采集和挖掘处理,数智技术还可以准确刻画相关人员的行动轨迹,增强立体化监督透明度。公众以线上形式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的同时,政府也可通过数智技术加强内部监督,确保权力运行的透明和合规。如上,数智技术以赋能协商成果执行效能和监督效能促进协商民主善治化,实现民主绩效的帕累托改进。如,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不仅将议事协商全程进行网络直播,而且设立“码上查情”栏目,群众通过扫码可查询协商活动的具体内容、解决措施、责任部门和进度情况,以倒逼力量推动议事结果落实^[10]。

5. 培塑协商文化,构建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传播矩阵

协商文化是协商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的精神凝练。“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普遍支持政治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35]数智技术有利于深刻挖掘和吸纳各种资源,促进协商文化传承、创新和传播。

协商民主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36]。数智技术赋能形成了政治社会化、个性化、生活化的新型协商文化,推进民主共同体建设。数智技术本身具有包容、共享、精确等价值与优势,带来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政治价值在数字时代衍生出新的内涵^[37]。自媒体时代短视频给普通民

众提供了宽广的文化产生和展示平台,解构了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和话语垄断,在大流量中增强了自我与群体认同,引起公众情感共鸣。以评论回复、群聊讨论为代表的互动模式使协商参与便捷化、常态化,沟通更充分深入,有助于在公众之间建立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启动“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26]237},不同观点的碰撞融合,则为协商文化加持个性化的数智底色。作为参与式文化载体,数智协商成为社会性的连接纽带与社会运动的发起平台,增强了人们对共同体和共同命运的意识,能引导公众日益通过集体互惠的横向关系和网络渠道联结成民主共同体,全方位拓展了协商格局。

数智技术赋能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和价值传播。4K超高清、5G网络传输、AI合成主播、VR全景、语音模拟等构建了以内容生产、汇聚、媒体分发平台相叠加的新技术体系,驱动主流媒体转型升级和全媒体传播的精准到达^[38],能大力挖掘中国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外话语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与此同时,高峰论坛、学术会议等线上线下交流模式不仅有助于总结国内先行地区实践经验,还可以学习、借鉴与吸收国外有益做法,推动中西协商民主交流互鉴,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国际视野,将中国式民主价值传播得更远。

三、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风险挑战

信息技术在孕育着走向数字民主巨大机会的同时,也潜伏着滑向“数字利维坦”的现实风险^[39]。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过程中,面临着监管挑战、价值冲突、失衡问题与技术风险。

1. 民意舆情治理和信息安全保护难度升级

技术更新迭代迅速,治理机制和监管体系往往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导致制度的滞后性和动态响应不足,亟须重视数智协商实践中舆情治理、信息保护等机制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建设。数字时代,民意容易被歪曲、炒作,舆情数据采集与处理复杂性递增、舆论引导难度增加,且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大众在网络中直抒胸臆虽构成最直接的民意表达,但这种民意

并非都是真实的,资本引流、网民泄私愤、“水军”炒作等情形都可能掀起舆情的巨浪^[37]。舆情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虚假信息、谣言等噪音数据大量存在,借助数智技术快速传播,其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增加了数据处理和舆论引导的难度。同时,公共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挑战加剧,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有效利用数据进行舆情分析,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安全涉及信息的保密性、可用性、完整性和可控性,包括网络通信链路安全和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数智协商实践涉及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传输,任何环节都可能引发数据泄露或隐私侵犯等问题,对协商民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构成威胁。据报道,不法分子利用科技公司参与新农保认证、推广 APP 的机会,窃取个人信息,倒卖 1.9 万名偏远农村老人的实名认证账号^[40]。技术操纵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用户的个人数据并进行分类分级贩卖,不仅损害协商民主的公正性和信任度,还可能导致公众对数字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

2. 数智技术嵌入与民主价值冲突风险高企

数智技术赋能遵照“工具主义”“效率至上”思维模式,简化规则,对协商过程与结果有着高精确化、可预期性的刚性要求,而协商民主是一种非竞争性的“柔性民主”^[41],秉持包容开放的协商理念,内蕴情感与理性的博弈和权衡,二者融合须妥善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崇拜和数字迷信会使技术成为一种强势逻辑支配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过程方式和发展方向,将协商民主由党政主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异化为依附机器,以效率与成果为唯一追求,最终削弱主体尊严和人文关怀。

一方面,数智技术有削弱参与主体理性思考、判断和表达能力的可能。“民主需要思考、耐心和再三考虑。”^[42]“信息超载”剥夺了用户有限的认知资源与注意力,形形色色的价值观混合杂糅在一起,滋生网络民粹主义、虚无主义,进一步造成人们认知、判断和思想上的混乱,加剧非理性化表达。社交媒体群组功能的优化和算法推荐加速网络空间“巴尔干化”,个

人偏好代替公共理性,协商主体“各自在封闭的情形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43]。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嵌入协商民主存在侵蚀公共精神、降低公共领域社会价值的风险。互联网上的“转评赞”参与因为缺乏空间感、代入感和现场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参与淡漠体验。数字通信的广泛普及致使“公共”“私人”之间的区分消散,影视明星、产品营销等成为公共话题的聚焦点,数字空间过度商品化与泛娱乐化,且在资本助推和需求刺激下,商业广告往往会以“博眼球”的方式制造公共舆论,恶化“公共领域的商谈功能”^[44]。

3. 算力基础设施和协商渠道建设不足引发数智技术赋能不均衡

因资源禀赋差异和重视程度不同,各地区、各层级在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过程中往往会在不充分不全面的情况。其一,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地区数字化进程滞后于城市。《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不同农村区域的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差距较为显著,东部乡村地区的人均投入为 231.8 元,明显高于中西部乡村地区的 80.2 元和 89.4 元^[45]。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部分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面临数字鸿沟的挑战^[22]。其二,数智基础设施有待优化升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仍存短板,算力网络传输性能、协同调度能力仍有待提升,如在数智赋能过程中存在算力支撑问题,已经出现了在线人数较多而导致数字公共服务瘫痪的案例。其三,协商渠道制度建设和资源投入差异使数智技术在协商民主不同渠道、不同层级嵌入不均衡:一方面,虽然党政机关的协商制度建设较为良好,但社会和基层协商制度建设则相对滞后^[46]。基层部门缺乏专业化的数字人才队伍,基层力量不足以支撑数字技术集约化建设,难以有效承接直播协商类技术性较强的事务。部分基层政协缺乏数字化专业设备和远程协商会议室,能够承接政协云建设的县级第三方信息技术公司的水平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数智

技术在协商民主各渠道的嵌入程度参差不齐。数字政府、数字政协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实现了快速发展,而各地区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的数智实践则显得相对缺乏,存在被边缘化和弱化的现象。此外,各协商渠道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和平台联动机制,因此没有形成协同效应。

4. 技术操纵和平台悬浮催生数字民主泡沫

数智技术在成为关键政治资源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锋利工具,操纵协商结果。如,在资本纵容与权力控制下,技术狂飙不仅会扭曲公众舆论,还会通过算法黑箱有意规避法律规制,操纵协商结果,误导个体真实利益需求,煽动产生非理性、情绪化的语言和行动,扰乱协商过程。

平台悬浮指由于技术应用不当或主体能力不足,使数智协商平台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产生脱节或分离。“当数字技术平台的开发沦为应付科层压力或彰显政绩、获取上级注意的权宜之策而不贴合基层现实情况时,数字悬浮便由此产生。”^[47]一方面,作为外嵌型资源,数智技术需要考虑与参与主体、协商场景、现实条件的适配性,超越协商主体数字能力和背离实际需求的平台极易沦为“盆景”,使数智协商民主只存在于技术政治浪漫主义者的想象。另一方面,数智实践“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效能“质”的提升,一味关注下载人数、平台数量、迭代次数等量化呈现会导致数字民主泡沫和虚假繁荣。若现实协商参与和成果落实等制度并未有力执行,忽视实际成效和群众满意度检验,表面上虽实现了数据流和使用量的增加,实质则为简单的应用堆砌和数字空转,看似作为,但却滋生出“指尖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

四、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推进路径

协商民主全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持续的、协调的、动态的制度系统及其实践过程”^[48]。规避数智“负能”而强化“赋能”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加速设施建设,完善制度供给,在提升参与主体数智素养、发展协商文化的同时坚守人民立场,防范技术风险和智能陷阱,

以“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融合与协同共进。

1. 加强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更符合民主目的的平台开发

统筹规划数智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为数智协商打造更为坚实的硬环境支撑。一方面,增进平台集约化和技术融合化,结合政府网站、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数据中心、政务新媒体等存量资源搭建数字协商平台,整合联通各级各部门分散建设的业务系统、自建机房和共性应用,加强跨部门共建共用共享。另一方面,加强跨区域均衡发展,继续深化电信普遍服务,推动农村地区5G和光纤网络建设,制定数智产业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增强经济效益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载力。联合科技领军企业夯实算力底座,满足数智协商算力需求。如“华为云”创新设计多元算力对等池化架构,从算力规模、扩展模式、使用模式匹配超大规模算力诉求,以盘古大模型深化人工智能在政务办公、政务服务等多领域的研发创新和场景融合^[49]。

“智能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应用程度和适配度是效能实现的关键。”^[50]数智协商平台应进一步普惠化、便捷化,简化操作,降低使用门槛:一是相关技术开发者应持续改进算法程序和软硬件设施,全面提升系统架构科学性、运行程序稳定性、数据信息安全性和操作界面友好性。如,语音搜索支持方言识别,上线数智协商APP“新手引导”“适老助残”等功能,推动数字包容和数字技术普惠共享,为协商主体意愿表达扫清操作障碍,提升协商平台用户体验和使用黏性。二是政府应以竞争性磋商等方式引入科研机构、企业 and 创新团队为数字党建、数字人大、智慧政协建设供给专业技术方案,并提供政策顾问,推进更符合民主目的的平台开发。三是互联网头部企业应在政府引导和自我审视下寻求民生诉求和市场需求的统一性,承担社会责任并使其成为商业推力,而不是通过信息滥用、诱导沉迷等算法操纵强化网络营销和资本运作,“用监视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裹挟人民”^[51]。当前,由工信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中国信通院研究起草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推荐合规自律公约》已发布,可进一步研究制定《算法透明公约》,以促进行业自律。

2. 培育多元主体数智素养,以数智技能促进协商技能全面发展

为防范技术操纵和平台悬浮,要提升多元主体的数智素养,培养正确的数字认知,并利用其掌握的数智技能进一步推动自身协商技能发展。一方面,深入贯彻落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通过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数字助老爱心帮扶公益活动、信息无障碍建设行动等主题活动帮扶数字弱势群体,通过科技馆开放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政协“数字文史馆”等形式优化数智认知教学资源供给,以通俗易懂的科技类纪录片、图书推荐、短视频推送等日常信息获取方式进行科普宣传,面向大众普及数智技术基础知识和底层逻辑,建立正确的技术工具认知,对算法祛魅。另一方面,面向多元协商主体需要因人制宜、因事而动,以数智参与进一步发展其协商素养和技能。针对领导干部,可依托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和高校基地,开展《党政干部大数据应用和管理》《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数智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等专题培训,结合研讨、调研、模拟政协等互动形式,提升领导干部利用数智技术发展协商民主的能力。针对群体或组织,应通过数字平台进一步整合组织资源,优化自身管理,扩大社会影响力,在协商活动中更好、更精准地传递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诉求。针对社会民众,持续创新融媒体内容呈现和传播形式,通过数智手段激发群众参政议政热情。如,“学习强国 APP”集成政策解读、优质电子书、慕课、新闻频道、数字博物馆等免费精品资源,可开放碎片化时间增进协商知识储备的学习通道。

3. 提升赋能均衡性,深化数智技术在各协商渠道的嵌入融合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内含各渠道的优质均衡发展,必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深入挖掘数智技术在各协商渠道要素、流程、形式、实践的嵌入点。

①在政党协商渠道,利用数智技术丰富和规范会议、约谈、书面协商形式,创新知情明政、考察调研、工作联系和协商反馈机制,完善民主党派门户网站、移动 APP 客户端建设,以 H5 动态页面展示参政议政成果,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智库作用。②在人大协商渠道,依托人大数字化改革契机改善协商各环节,推进“人大代表码”“网上代表联络站”“数字人大”“参与式预算数智在线”等应用建设。如,杭州拱墅区对人大代表的关心事项、专长偏好、议事能力等数据进行数字化归集,智能筛选参与“云协商”的合适代表和议事员,精准赋能人大协商^[52]。③在政府协商渠道,开放获取充分准确的信息是政府协商产生实际效果的重要基础。为此,应基于政策导向、民众关切和现实需求,利用大数据协助确立重点议题,在年初审议印发《年度协商计划》并面向公众发布,明确每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开展时间。针对突发性和应急性议题,要通过民意监测大数据、舆情预警机制提前准备、及时响应,必要时以直播形式保障议事信息公开透明。④在政协协商渠道,一是要统筹加快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数智化转型,推广“码上议”“秦商量”“政协云”等平台建设经验,推动全国政协智能化建设和委员移动化履职。二是推进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常态化运用,全面配置远程协商会议室、数字终端、机房等硬件设备,并增配专业人员负责数字平台的运行管理和维护升级。⑤在人民团体协商渠道,基于数字统战系统搭建建言资政、资源共享和联谊交流平台,发挥人民团体人才聚集和动员能力强的显著优势,拓宽人民团体参与政治协商的途径。⑥在基层协商渠道,一方面自上而下探索试点,借鉴衡阳“人工智能+屋场恳谈”、杭州“红茶议事会”“米市协商铃”的建设经验推进地方实践;另一方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协商满意度问卷调查,通过微信群、小程序等数字平台构建自下而上的常态化监督机制。⑦在社会组织协商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专业性和独立第三方特点,在各类平台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发声机会和沟通渠道。⑧在各协商渠道协同配合方面,一是要建立公共数据平台,促进资源集聚和数

据共享;二是尝试构建聚焦协商民主领域的综合性网络社区,要求用户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认证,在发帖或留言时显示职务,提供协商活动报道、协商案例分享、协商经验交流的专门平台。在强化技术应用的同时,需注意传统协商与数智协商的补充配合和协同发展。如,针对老年人、儿童及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戴村工分宝”开发记载姓名、照片、二维码的“工分卡”和“红领巾卡”^[53]。正确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根据协商主体与议题的不同类型选择适当的协商方式,给予民众选择空间,在数字与现实空间两个场域推动协商民主全面发展。

4. 完善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与法治保障

数智技术的赋能力度和持续度,“既有赖于技术支持力获得突破和允许的程度,也取决于总体性的宏观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持续释放民主的活力”^[16]。《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数智技术赋能政治场域的战略构想,但有效落地还需在既有民主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中融入更多“数字元素”,出台新的制度机制和监管法案形成长效动力,为柔性协商民主确立刚性规范。一是建立考核和监测机制,规避数字形式主义。以群众满意度、成效显著性作为绩效衡量的重要依据,定期对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进行检查、抽查和情况通报,包括意见回应是否及时、网站内容是否定时更新、搜索链接等功能是否完善、政策解读文件是否及时发布等,并要求限期整改。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将线上群众问题的应对情况纳入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二是指导平台设立舆情治理机制。对恶意炒作、煽动不良政治情绪的用户限制发言或清除ID;置顶、加精官方回应和有理性有深度的分析帖;通过关键词过滤、内容审查、后台身份审核等技术手段保障信息真实。如,抖音为增强“自媒体”账号可信度,要求粉丝数量达到50万且发布涉及时政、社会、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内容的“自媒体”账号需授权平台在账号主页展示通过认证的实名信息。

“民主的激情需要法治的理性进行节制和

引导”^[7]。一方面,有必要构建以“民主协商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确定协商民主的地位,对协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责与权力、数智技术的应用规范作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协商结果以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在推进数字法治的前提下,强化技术规制、细节公开和安全标准,突出立法前瞻性,维护算法正义和信息安全:一是完善算法监管法案,防范算法黑箱导致的技术操纵风险。加快出台《人工智能法》《数字反垄断法》等监管法案,充分借鉴美国《过滤泡沫透明度法案》《停止算法歧视法案》、欧盟《算法服务法案》、英国《算法透明度标准》等国外规制措施,有序开展算法备案工作,构建算法透明机制。二是持续通过法治保障维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公共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等相关法律条文的修缮工作。关于在数智协商实践中如何平衡个人隐私与数据利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明确指出,涉及个人信息的公共数据要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脱敏和匿名化处理,避免侵犯个人的信息权益。

5. 以价值逻辑引领技术逻辑推进协商民主对数智技术的双向赋能

“只有技术被真诚地服务于民主,并且我们对技术对民主的复杂影响保持足够清醒时,技术的益处才会展现。”^[42]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目标为数智技术进入民主实践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应用原则和价值导向,为数智协商民主空间规划了规范性轮廓。进一步促使技术向好向善需要秉持以下原则: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数智化建设工作,以人民整体利益而非效率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以智慧党建强化党的思想引领力和数智领导力,保障党对信息数据库的绝对控制权。第二,传承“和合”“民本”等传统优良协商文化的核心要义,推动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质和真谛,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良传统,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积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20]未来,应持续

探索应用数智技术广泛开展文化宣传,传播协商观念,将优良传统中的公共精神和民主共同体的建设相结合,包容精神和平等对话的理念相结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培育新型数智协商文化。第三,在推进数智协商民主进程中,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约束。只有以人为依归的民主,才能够持续保持其活力与效能。数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要尊重人性、人道、人伦规范,按照人类价值观对人工智能的价值系统进行校准,以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为要义,以促进实质民主参与为旨归。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8.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7.
- [4] 习近平.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N]. 人民日报,2022-04-20(01).
- [5] 王秉. 何为数智:数智概念的多重含义研究[J]. 情报杂志,2023,42(7):71-76.
- [6] 高奇琦. 数字技术如何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落实[J]. 政治学研究,2022(6):63-74.
- [7] 伍俊斌. 网络协商民主的契合、限度与路径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3):130-140.
- [8] 汪波. 信息时代数字协商民主的重塑[J]. 社会科学战线,2020(2):198-203.
- [9] 郭一宁. 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 探索,2023(1):66-77.
- [10] 邬家峰.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J]. 新疆社会科学,2022(5):1-9.
- [11] 詹国辉. 数字协商民主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以Y市政协云平台为例[J]. 探索,2024(2):44-57.
- [12] 张露露.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数智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与完善路径——基于全国四个典型创新案例的观察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2024,32(9):56-64.
- [13] 江小涓.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21(8):4-34.

- [14]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98.
- [15] 汪波. 大数据、民意形态变迁与数字协商民主[J]. 浙江社会科学,2015(11):41-47.
- [16] 陈家刚. 数字协商民主: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J]. 中国行政管理,2022(1):26-32.
- [1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241.
- [18] 王永香,王心渝.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环境及推进策略[J]. 中国软科学,2024(9):151-159.
- [1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9-21(02).
- [20] 冯春梅. 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写在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N]. 人民日报,2021-03-03(01).
- [21] 杨玉萍,王丹竹. 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逻辑、价值及路径——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点体会[J]. 新疆社会科学,2023(3):1-10.
- [22] 国家数据局.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EB/OL]. [2024-12-06]. https://www.szzg.gov.cn/2024/xwzx/szcx/202406/t20240630_4851743.htm.
- [2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5-23]. <https://www.cnnic.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 [24]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4.
- [25] 小约瑟夫·哈林顿. 哈林顿博弈论[M]. 韩玲,李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0.
- [26]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列,赖海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7] 桑玉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07.
- [28] 袁方成,刘桓宁. 大数据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机制创新与推进路径[J]. 新视野,2022(2):37-43.
- [29]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年)》[EB/OL]. [2024-12-06]. https://www.cac.gov.cn/2024-09/06/c_1727308607362592.htm.
- [30] 费什金. 协商民主也是一种实践方法[N]. 光明日报,2013-11-27(13).
- [31] 浙江新闻网. 当“区块链”走入乡村 萧山戴村镇运用数字技术探索基层共治共享新路[EB/OL].

- [2024-12-08]. 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2004/t20200410_11866827.shtml.
- [32] 韩志明. 过程即是意义——协商民主的过程阐释及其治理价值[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2): 55-62.
- [33] 陈家刚. 数字协商民主: 可能性、风险及其规制[J]. 教学与研究, 2022(7): 74-84.
-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7.
- [35] 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M]. 李柏光, 林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8.
- [36] 张保伟. 影响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几个问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53-60.
- [37] 李石. 数字时代的政治[J]. 学海, 2023(3): 168-175.
- [38] 王永贵, 王景宇. 新时代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多重进路[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3): 17-24.
- [39]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 詹姆斯·W·科塔达. 信息改变美国: 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M]. 万岩, 邱艳娟, 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2.
- [40] 李婧. 新农保认证多刷一次脸咋就被窃取了个人信息? [N]. 农民日报, 2023-02-17(005).
- [41] 周岑银.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 2013(4): 10-13.
- [42] 本杰明·巴伯, 叶敏. 数字政治的不确定性后果——民主与信息技术的难兼容性[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4(2): 5-9.
- [43]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1.
- [44] 孔明安, 靳欢欢.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J]. 学习与探索, 2023(10): 8-16.
- [45] 中国网信网.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EB/OL]. [2024-12-06]. 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309718486615.htm.
- [46] 廖清成, 罗家为. 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制度创新与逻辑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2): 192-199.
- [47] 于水, 区小兰, 罗珞峻. 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悬浮: 内涵表征、形成机理及消解策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4): 79-88.
- [48] 陈家刚. 协商民主: 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1): 60-65.
- [49] 吴蔚. 华为: 为数智生态夯实算力底座[N]. 经济参考报, 2024-06-17(008).
- [50] 张鑫, 张露馨. 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阐释及效能提升[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5(6): 36-45.
- [51] 段治文, 于雯美. 元宇宙数字协商民主的机遇、风险和逻辑进路[J]. 学术界, 2022(11): 144-154.
- [52] 杭州人大网. 拱墅区: 以数字“画像”做实基层人大协商四环节[EB/OL]. [2024-08-29]. https://www.hzrd.gov.cn/art/2023/9/6/art_1229690489_18913.html.
- [53] 平安浙江网.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戴村探索[EB/OL]. [2024-12-09]. https://www.pazjw.gov.cn/wangqunxinxi/hangzhoushi/202108/t20210823_22990704.shtml.

Mechanisms, Challenges, and Path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Yongxiang, WANG Xiny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imperative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modernizing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Since the emerg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ltative democrac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electronic, networke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hina construction, the strategic task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e practical ne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digitally-empowered consultative practices constitute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rough the enabl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 subject activation - mechanism innovation - efficiency improvement - culture cultiv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reates precondi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by constructing digital negotiation space and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and activates the internal drive of participants through structural restructuring, consciousness enhancement, and skill cultivation.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is refined through innov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such as agenda setting, process management, risk assessment, and intelligent adjustmen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motes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consultation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sultation results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enabl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sult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and value disse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also faces risk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increased difficulties in governing public opinion and protect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lic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and consultative channels, and risks of technological manipulation and platform detachment. I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enabl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various consultative channels based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 and cultivat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multiple subjects, improve the balance of enabling,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legal guarantee, and lead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oward socially responsible outcomes through value-driven logic an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onsultative democrac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echnology empowerment; digital governance